

明武宗新论

滕新才

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是明朝第十位皇帝。1505年即位,改元正德,1521年去世,在位16年。

对明武宗进行全面评价,史学界素少向津。近世学者虽有涉及,但既非专论,又多失之偏颇,如:“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①“明朝中期的皇帝的贪婪、残暴和腐败,又相对地集中在明武宗(朱厚照)的身上,成为皇权罪恶的典型。”^②“明朝的封建政权,到了正德时期,腐朽反动的程度愈益加深,统治集团也就更贪婪、腐朽和残暴,……其反动腐朽的本质,充分地由皇权统治的集中代表者——朱厚照(武宗)的罪恶活动表征出来。”^③不可否认,武宗统治时期的确存在着一些败政,如带头兼并土地,扩大皇庄;大兴土木,沉湎声色;“耽乐嬉游,昵近群小”^④,致使在位期间经济不景,“国乏民贫”^⑤,宦官专权,奸佞用事,宗室叛乱,人民起义。尽管如此,武宗也并不总是昏庸、残暴的象征,皇权罪恶的典型。相反,从武宗一生的言行来看,他不仅有許多值得赞誉之处,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具有个性特色的封建君主。本文拟就此略抒管见,以就教于史学界同行师友。

武宗尚武通文,谙熟礼仪,在位期间先后平定了安化王朱寘鐇、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客观上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武宗北巡至阳和,恰逢蒙古韃靼小王子率五万余骑从榆林入侵,驻玉树,掠应州。面对强敌,武宗沉着应战,指挥大同总兵王勋等部各分据要地,严阵以待。十月,小王子分路南下,正式揭开了战幕。武宗令宣府游击时春、辽东左参将萧滓率军支援王勋;令副总兵朱銮、游击周政尾随蒙军之后;又调宣府总兵朱振、参将左钦等军会集阳和,参将江桓、张昇为后应。这样,各路人马络绎相继,互相声援,从布局上说已立于不败之地。此后双方多次发生遭遇战,特别是涧子村大战,王勋、萧滓、时春、周政诸军被蒙军拦腰切断,分割包围,形势非常危急。在这关键时刻,武宗亲率提督太监张永及朱振、左钦各部从阳和来援,殊死战斗,蒙军后退,诸军得以会合,转危为安。次日,蒙军来攻,武宗督促诸将顽强抵抗,自辰时持续到酉时,大战百余合,蒙军败走。武宗率诸将且战且追,直抵平虏、朔州等地边境。“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⑥,虽然战果并不辉煌,但给蒙军以迎头痛击,使小王子没有达到目的即引兵远遁,“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⑦,从而使北部边境免遭蹂躏,此武宗之功也。纵观有明一代十六帝,能统军出塞,亲临沙场,冒弓矢,张斧钺者,自成祖以降,仅武宗一人耳。

武宗统治时期，赈灾免赋一如故事，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举例于后：

正德元年（1506）五月，减苏杭织造岁币。六月，禁吏民奢靡，免陕西被灾税粮。

正德三年（1508）九月，赈南京饥。十一月，赈凤阳等地饥。

正德六年（1511）三月，免江西、直隶、河南、山东等省“被寇”州县税粮一年。

正德十四年（1519）四月，免南畿灾区税粮。五月，诏山东、山西、河南、湖广流民归业者，由政府供房舍、粮食、耕牛和种子，并免税五年。

正德十五年（1520）四月，赈淮、扬诸府饥。八月，免江西税粮^⑧。

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德时期赈济之广，几遍全国；持续之久，与武宗同始终。所以《明实录》称赞武宗“蠲积欠，休养疲卒，宥免逃匠，停罢贡献，裁革冗食；禁约内官收受毋横索，以贲累重征；庄田输纳，岁租毋过取，以逼民逃窜。……凡四方水旱，知小民饥歉无以为生，亟下赈贷蠲免之令，敬天勤民之心，盖未尝不因事而裁成也”^⑨。当然，从这些蠲赈中得利最厚的往往是富家地主，但也不可否认，历年的蠲租免赋，多多少少也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其它如屯田、开矿，以两淮、浙江、四川、河东盐课充陕西织造，以及疏浚通惠河、滏阳河，筑桑乾河决口，修滁州、和州、六合各河以利江北屯田等等^⑩，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武宗时期，朝臣请止嬉戏戒游幸而不听者在在有之，廷杖诸臣、罚跪午门的现象也屡屡可见。但武宗并不总是一个暴君，他也有纳谏悔过、善待群臣和不为左右所诳的时候。

正德元年二月，大学士刘健上疏指责武宗“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因此请赐退休。武宗不但没有怪罪，反而优旨劝慰挽留。五天后，刘健再次上疏，历数政令十失，请通盐政、正官纪、严刑罚。武宗“不得已”而“勉从之”，“由是诸失利者咸切齿”^⑪。

同年六月，刘健又上疏指斥武宗“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者杂交于前，臣不胜忧惧”。这一番痛心疾首的诚言挚语，深深地触动了武宗的灵魂，他慷慨激昂地说：“朕闻帝王不能无过，贵改过。卿等言是，朕当行之。”^⑫于是刘健趁热打铁，录廷臣所陈时政切要者，请武宗朝夕省览。武宗也给予了明确答复。

然而武宗最大的毛病在于“狎近群小，终不能改”，不久即遣宦官崔梟提督织造。崔梟请拨盐引2000万，遭到刘健等人一致反对。武宗把他们召到暖阁面议，颇有诘问，最后正色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遂赌气照崔梟所请之数拨给盐引。但是武宗随后便觉悟了，“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请。于是中外咸悦，以帝庶已改过”^⑬。

综观武宗一生所为，最快人心者莫过于正德五年智除刘瑾。虽然他对刘瑾专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他发现其专横跋扈之后，则能“翻然悔悟，不旋踵剪除”，“其天德之刚，非汉唐昏懦之主所可同日语也”^⑭。

当时刘瑾擅政，势焰熏天，满朝公卿皆出其门。武宗虽有扳倒刘瑾之意却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年仅20岁的小青年，而刘瑾则老奸巨滑，阴险歹毒，搞不好就会重演一幕“甘露之变”。所以，武宗表面上藏智守愚，寄情鹰犬，暗地里却在静观时变，等待良机。

机会终于来了。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由于争权夺利发生了分裂。张永原是“八

虎”成员之一，与刘瑾为党，后来“恶其所为”，曾奋拳殴辱之。其他如马永成、谷大用等也因有所求而刘瑾不应，皆怨之。于是武宗决定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以阉图阉。恰逢安化王朱寘镛叛乱，又给武宗的计划增添了一服催化剂，他不失时机地起用右副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军务，并遣张永为监军，准备内外相联，铲除刘瑾。正德五年四月，武宗戎装披挂，亲自送张永至东华门，特赐关防、金瓜和钢斧，以示厚宠。刘瑾非常嫉妒，但因武宗正向着张永，却也无可奈何。他更不会知道，张永此行，已经决定他的命运朝不保夕了。以后来杨一清说张永曰“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可知”的情形来看，派张永监军宁夏，的确是武宗铲除刘瑾计划中十分重要的步骤。

果然，张永一到宁夏，杨一清就积极与他结纳，相得甚欢，并乘机谋除刘瑾。开始张永尚有顾虑，杨一清便为他分析形势，指明有武宗的支持为后盾，他说：“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请问论军事，因发瑾奸，极陈海内愁怨，惧变起心腹。上英武，必听公诛瑾。”于是张永勃然而起：“嗟乎，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⑤

此时刘瑾也有了篡位之心，准备于八月十五日作乱。在这紧急关头，张永先期而入。武宗亲迎之东华门，并设宴慰劳。及夜，张永参劾刘瑾不法17事，武宗点头说：“刘瑾负我。”下令逮捕，随后寸磔于市，并诛其党羽。于是人们终于明白了武宗“于小人虽始暂为所误，既觉之后，裁以大义，不为柔道所牵”^⑥。

正德十二年七月，武宗将往宣府巡视。驻居庸关御史张钦上疏反对，武宗不听，于八月微行至昌平。张钦乃命指挥孙玺闭居庸关，并将钥匙藏去。武宗召见孙玺，孙回绝说：有张御史在，臣不敢擅离。武宗又召分守太监刘嵩，张钦便手持利剑坐在关门下：“敢言开关者，斩。”武宗第三次派使者亲来叩关，张钦按剑叱之，使者惧而返，对武宗说：“张御史几杀臣。”武宗大怒，高呼：“为我趣捕杀御史。”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实则无可奈何，只得从昌平怏怏而还。20多天后，武宗乘张钦巡视在外，才再次微服出行，过居庸关。明年，“从宣府还，至关，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归矣。’然亦不之罪也。”^⑦在君权至上的封建时代，张钦敢于一再虎口捋须，而武宗在大怒之下竟也不治其罪，表明他在某些时候的确有着宽阔的襟怀。

正德十三年六月，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巡边，以江彬为威武副将军扈行，召大学士梁储令草制。梁储说：“他可将顺，此制断不可草。”武宗大怒，挺剑而起：“不草制，吃此剑。”梁储伏地泣谏道：“草制则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武宗沉吟良久，掷剑而去，“乃自称之，不复草制，彬亦罢副将军”^⑧。在那专制的时代，皇帝杀臣如诛一狗，梁储逆命而不见罪，武宗之胸怀又可见焉。

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欲往南方，群臣力谏，络绎不绝，武宗“为之感动，竟罢南巡”^⑨。六月，宁王朱宸濠叛乱，武宗决定亲征。至临清，传令进宴，等到开宴时，却发现他的座位上没有筷子，武宗视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时有太监黎鉴欲假公济私，都御史王翊不许，黎鉴恼羞成怒，以头触之，两人发生争执。黎鉴跑到武宗面前哭诉，武宗不但没有支持他，反而一语破的：“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抚何敢辄辱汝也。”^⑩可见武宗遇事有主见，不偏听偏信，所以清朝史学家毛奇龄称赞他“有容德，且不为左右所诳如此”^⑪。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病重，自知已不可为，遂对守候左右的太监陈敬、苏进

说：“前此事皆由朕而悞，非汝众人所能与也。”②在临死前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过错，亦不失为了一件幸事。遗诏以宗室中“稍明事理”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位，致嘉靖初年“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③，此亦武宗远见卓识之处。

在武宗统治的16年里，先有刘瑾专权，后有江彬佞幸，宗室叛乱则寘镛、宸濠，人民起义则杨虎、刘六、四川、江西，边事则鞑鞑、哈密，烽火连天，狼烟四起。然而武宗卒能晏然死于豹房，“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高度评价士大夫在这一时期的作用，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除此以外还与武宗的个人才能很有关系。观乎武宗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是荒淫迷乱，另一方面却又睿智精明；一方面是挥霍奢侈，另一方面却又蠲赈惠民；一方面是宠幸佞倖，另一方面却又宽遇群臣。武宗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反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出的皇帝。

那么，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何在呢？按照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角色理论”的解释，任何一个人物都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这种角色一般是通过人际关系反映出来的。一旦角色发生改变，即历史人物由一个角色进入另一个新的角色时，由于新旧习惯的不同，社会对新旧角色的要求不同，这就必然会产生剧烈的角色冲突，结果导致某一方面的角色失败，或者说不适合于扮演这方面的角色，于是便从另一个方面以另一种角色加以补偿。明武宗就是这样，他没能很好地扮演皇帝这个角色，却很自然地扮演了朱厚照的角色。因为社会要求皇帝这个角色必须老成持重、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勤政爱民，而武宗的性格特征却是刚强坚毅、英武警敏、直率开朗、热情活泼，属于心理学上的外向型和气质学上的多血质。这就使得他的行为举止易受情绪影响，从不拘泥于传统，很少有约束自己的框架，从而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加以武宗少年继位，个体发展并不成熟，陡然登上九五之尊，尽管不谙政事，却不得不摆出皇帝的姿态，每天天不亮就去视朝，接受大臣例行的朝拜和奏请，批阅一大堆头绪纷繁枯燥乏味的章疏。因此，年仅14岁的明武宗，一开始就对政事很不感兴趣，他和所有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少年一样，喜欢的是无忧无虑的嬉游、自由自在的玩乐。本来武宗的资质是不错的，假如承孝宗之遗泽，循规蹈矩，励精图治，当不失为“贤君明主”。但联系他后来的行为看，武宗自始至终不喜欢扮演皇帝这个角色，也不愿接受传统的束缚，这种皇帝共性与朱厚照个性的冲突，使武宗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多才多艺的纨绔子弟、一个能文能武的公子哥儿，从而也就使得他的才干不能在皇帝的宝座上充分发挥，他的缺点却在皇帝的优越环境中暴露无遗。这是历史的造就，并非完全出自主观愿望。

笔者说武宗不喜欢扮演皇帝的角色，根据之一是他不愿受宫廷中清规峻律的限制，而是向往逍遥自在的生活。登基不到两年，武宗就搬出了紫禁城，“于西华门外别构院籓，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⑤，最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与他所喜爱的音乐、游猎朝夕相伴。后来数次出塞，留恋宣府，则是他向往自由的进一步发展。他周围的亲信，先是刘瑾常以鹰犬博取他的欢心，后是江彬的勇敢机警令他赞赏，处于传统势力包围之中的明武宗，十分自然地容易和他们亲近起来。特别是江彬游说武宗巡视边防，纵横驱驰，瞬息千里，这与武宗追求自由的心理不谋而合，在因循守旧、按部就班的模式和鼙鼓旌旗、金戈铁马的刺激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于是就产生了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的北巡南幸，虽然一些佞幸小人打着他的牌子招摇撞骗，给沿途百姓造成了灾难，但这毕竟

不是武宗的本意，对他来说，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自由的实现。

根据之二是武宗把皇帝的名份、权势和威仪看得十分淡泊，这就是《明史》上说的“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①。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北巡至阳和，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随即又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正德十三年七月初二日，武宗传旨：“北寇屡犯边疆，诚恐四方兵戎废弛，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尤为要害，今特命总监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往征。”^②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手敕吏部说：“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又传旨谕礼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令往南北两直隶、山东泰安州等处尊奉圣像，供献香帛，祈福安民。”^③这种放弃皇帝至高无上的威权，故意表现自己将才帅略的做法，是封建传统的卫道士们怎么也不能理解的，翰林院修撰舒芬就指责武宗“以天子之至尊下同庶人，舍大辂衮冕而赢车裘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礼仪”^④。

对此，美国学者黄仁宇说：“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十四岁。他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与书呆子作对，也许正是他引以自娱的办法。”“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想，以至再也无法调和。”^⑤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武宗与朝臣的矛盾，是一场封建士大夫竭力维护传统与青年朱厚照试图摆脱传统束缚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很长时间内不为人所理解，并且成了指责他昏庸腐朽的口实。的确，他是皇帝，传统要求他具有皇帝的共性，但他首先是作为朱厚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因为他有一颗青春的心，有年轻人所特有的朝气与活力。在平时，如果朝臣谏议切实可行，一般说来他都能接纳。只有当他的出巡被群起攻讦，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的个性受到压抑时，他才奋起反击，给那班恪守传统的朝臣们一点厉害尝尝，将他们罚跪午门，甚至廷杖。但他并没有随心所欲地滥杀无辜。谈迁说，武宗“不罪一谏臣”^⑥，这足以表明武宗无论如何是称不上“残暴”的。

总之，对明武宗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的印象上，而应破除旧的藩篱，开辟新的蹊径，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次对他进行深刻的解剖，才能对这个历史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

注 释：

①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190页

②李洵《明清史》第72—73页

③李光壁《明朝史略》第85页

④⑧⑩⑫《明史》卷十六《武宗纪》

⑤⑥⑭⑮《明武宗实录》卷九十三、卷一九

〇、卷一五四、卷一七八、卷一七一

⑲《明武宗外纪》，见于上海书店印行《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

⑳《国榷》卷五十一

㉑《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㉒《明史》卷三二七《外国传·鞑靼》

⑬⑱⑳《明武宗实录》卷一九七

㉑《明史》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八《河渠志》

㉒⑳《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㉓《明史》卷一八八《张钦传》

㉔《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江彬奸佞》

㉕⑳㉖《明通鉴》卷四十八、卷四十二、卷四十七、卷四十一

㉗《明史》卷十八《世宗纪》

㉘《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

㉙《万历十五年》第95—96页、第98页